



雪莱抒情诗选



雪莱抒情诗选

查良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002号

雪莱抒情诗选

Xuelai Shuqing Shi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22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3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ISBN 7-02-001504-2/I·1331 定价 5.80元

译 本 序

英国十九世纪诗坛上的两颗巨星——雪莱和拜伦，是我国读者久已熟悉的了。他们在热情的诗歌中发出革命的号召，不知感动了多少心灵。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诗歌活动的话，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英国工人运动尚在雏形时期的代言人。关于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诺说，马克思曾称雪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社会迅速地分裂为一方面是贵族、资本家和极端富有者，一方面是赤贫的无产阶级；旧日比较稳固的中间阶层不断地分化，小工商业者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社会进步的动力无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头上。但此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比较薄弱的，政权还强有力地掌握在贵族及资本家手里。在这种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工人运动尽管前仆后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成熟发展起来：例如，较早的路德分子破坏机器运动和较后的宪章运动，便是以本身的弱点而致失败了的。但英国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意愿和憧憬却坚强地存在着。就是基于这一憧憬，产生了英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人雪莱(1792—1822)出生在富豪的贵族家庭，他所进的学校也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先是在伊顿中学，一八一〇

年进入牛津大学。可是，雪莱自始即对于当时由教会所严格控制的大中学教育深感不满。在牛津大学不过半年，便因为散发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而被学校开除出去。这激怒了他顽固的父亲，家庭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只保留对他微薄的金钱接济。他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从此，自十九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上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生活的贫困颠沛，再加以社会的诽谤和迫害，却丝毫没有顿挫雪莱的坚毅的意志。他本人就象他所歌唱的“云雀”一样，带着欢乐的歌唱直飞向他所向往的天空，从没有回顾和反悔。在资产阶级看来，他是“疯狂的雪莱”，是“毒蛇”；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太·安诺德有一句“名言”论及雪莱说：雪莱是一个“美丽的然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膀。”^①这就是某些评论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一切了！喜爱黑暗的人对光明是盲目的，因此安诺德认为雪莱的诗“缺乏内容”。可是，够了！让我们看看雪莱是怎样成长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吧。

给年轻诗人的心灵以深刻启发的，首先约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是阐述进步思想的书籍（政论方面如威廉·葛德汶的《政治的正义》、托玛斯·潘恩的《人权论》；哲学方面如洛克、休谟及斯宾诺沙的论著）；而最后和最有力的影响自然是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

① 今日的《剑桥英国文学简史》认为这句话未免美化了诗人，它说：“这是并不十分符合事实的。在雪莱的一生中有很多不美丽、不无实际效果和非尽天使般的作为。”这本文学史甚至说，拜伦、雪莱和济慈三诗人的早亡，“仿佛是对明显的罪恶的判决”。

会及政治运动。

雪莱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对物理、化学和电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自己的住屋中堆满了仪器，进行了很多试验。他认为自然科学会使人认识到自然界的秘密，帮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从而可以把人从“偏见”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离开学校后，他就不再接触实验科学了，但对科学的爱好已经给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认识奠定了基础。

诗人早年的政治见解固然部分地由阅读书籍而形成，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本身使他认识到英国的现实。这，我们可以由他当时所写的书信中看出来。

离校不久，他到了凯斯维克，就是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在那儿歌颂自然之美的地方。但雪莱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我看到了悲惨的景象。工人们处于饥寒中。我们的士兵被派到诺廷汉去了……若果他们是为了去杀死当地任何一个饥民的话，让上天诅咒他们吧。”他又写道：“在这凯斯维克，虽然风景是可爱的，但人们却可憎。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伸进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来到这里的大家族们，他们荒淫的奴仆也有助于使道德整个沦丧。凯斯维克与其说是坎伯兰郡的一个村落，勿宁说更象伦敦的近郊。河里常常发现被不幸的女工所扼杀的孩子。”不久之后，他到了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他写道：“在这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人间的悲惨可以达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蜷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这种情景多么巨烈地震动了我！”

雪莱在写过《无神论的必要》攻击宗教的权威以后，次年（1812年）二月十二日便带着新婚妻子海瑞特和自己所写的《告

爱尔兰人民》小册子，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实际革命工作，对他此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告爱尔兰人民》里，他写道，“人们侈言贫穷不是恶端，——他们定是没有身受，否则就不会这样想的。”“被统治者应该过问政府的工作。”“战争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难道是必要的吗？穷人从国家的财富或疆域的扩展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光荣’得不到什么，这个字眼不过是政治家用来掩饰他们的野心或贪婪罢了……穷人用自己的血、劳作、快乐和美德当作代价，来买这‘光荣’和这财富。他们为了这魔鬼的事业而死沙场。可悲的是：下层人民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过为了使压迫者更凶残地压迫他们而已。可悲的是，穷人必须把那使他们全家免于饥寒的财物当作税款交出来。……许多丰衣足食无所用心的人们在斥责改革；狠心的、或者无所用心的人们呵，有多少人正在你们权衡利害时忍饥挨饿，有多少人正为了助成你们的快乐而死去。”

这篇文告的煽动力是显然的，尤其可贵的是，它的立论完全站在赤贫的无产阶级一方面。由于雪莱当时深受葛德汶的政论的影响，这文告的结论还是主张“节制、冷静、仁慈和自持能给你们带来美德，阅读、会谈和思索能给你们带来智慧，等你们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反抗暴君了”。

爱琳诺·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能期望雪莱在他那时代就完全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复杂的过程及其后果。重要的是，“他竟能看出这种关系并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权衡它。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称为社会主义者”。^①

① 见爱琳诺·马克思·艾维林及爱德华·艾维林合著的《雪莱——社会主义者》。这里引文自俄文转译。

雪莱很重视他的爱尔兰之行，他认为“不是最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在等待他。他把《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一面廉价在书肆出售，一面还亲自在都柏林以各种方式散发它。他的妻子海瑞特曾在给希钦诺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你要是看到我们怎样散发小册子，你会大笑的。我们把它从窗口投出去，又把它分发给从我们街上路过的人。这样做时，真要把我笑死了，可是波西（即雪莱——译者）却严肃得很，昨天他还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一个妇人的袍兜里呢。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走过去了。”除此而外，雪莱还把传单放在用木塞塞好的玻璃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者用轻气球把它送往空中。

据当时报纸的记载，雪莱曾在都柏林的剧场中对爱尔兰的贵族们发表演说，效果非常好，很激怒了一些顽固派。

从当时的客观情势以及雪莱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来看，不消说，他是不会成功的。他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监视，却侥幸没有被捕。他在一八一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信给葛德汶说：“我已经把……出售的小册子收回，准备离开都柏林了。……我承认，我想组织无知的人民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不想再对文盲宣讲了。我将期待着我不可能参与的事件的发生，使自己成为因果中之因，而那个果将在我变为灰尘的许多世代以后出现的……”

这时雪莱才不过二十岁，便具有如此天才的远见！我们看到，他早年所形成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的信念，尽其一生未曾改变，并且与日俱增地贯穿在他此后的一切诗作中。他是一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家，但环境却不允许他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有所发展。因此他才转向写诗，开始以诗为武器，在思想上向私有制和反动派宣战。雪莱夫人在注释雪莱早年诗作

(1814—1815年)时,也有几句话提到这一点。她说:“在这以前,他主要想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因此写了一些文章向人民呼吁,号召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可是现在,他开始感到,行动的时机在英国还没有成熟,只好以笔作为工具,来为较好的一日扫清道路了。”

诗人的这一决定是高贵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放弃了实际活动和政治斗争,诗人的蓬勃精力和热情不能朝革命最有力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生活也无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相结合,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忧郁和自我怜惜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此后的抒情诗中也屡见不鲜。

本集最早的七首诗,是诗人在爱尔兰之行前后写出的,鲜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尽管这些诗是所谓“少年之作”(Juvenilia),在艺术上尚不成熟,一般雪莱的选集都不采用它们,可是,译者却觉得它们有特别可贵之处:和此后诗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不是特别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未受挫折的天真呈现在这些崇高的诗思中,而是为后来的一些作品所无的?关于这,我不敢武断;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些诗篇领会到诗人赴爱尔兰的革命行动,是被多么明朗的热情和战斗的意识所推动着的!是的,这是一个革命青年所写的诗!它的魅力似乎也正在这里。译过这些诗以后,再看一八一四年的《诗章》及随后的一些作品,显然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已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诗人的心情了。从这时到一八二二年为止,诗人还活了九年,这九年中他虽然主要地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作战,但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受的打击也很多。他的第一个妻子海瑞特不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而由于和葛德汶一家人的接近,他热烈地爱上了葛德汶的长女玛丽,两人在一八一四年七月私奔到瑞士,但同

年九月因经济困难又回到英国。这一时期，雪莱为了躲避债主，一度住到小客栈里去藏身。次年祖父死去，有一小部分遗产归于他，经济情况才好转起来；但雪莱从未富有过，因为他一旦稍有进款，便要慷慨地接济友人。一八一六年，由于社会舆论的迫害，又鉴于国外生活比较低廉，他和玛丽再度去到瑞士，并在日内瓦和拜伦结识起来。不久思乡思又回到英国。就在这一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人们传说是因为单恋雪莱的缘故；接着，诗人的前妻海瑞特也投河自杀，遗下了雪莱的两个孩子，这成了涉讼的对象。她的家人声称诗人没有教养子女资格，而托利党政府以雪莱是无神论者为借口，竟剥夺了雪莱抚养子女的权利，把他们判给外人抚养了。诗人对此极为愤慨，便在一八一八年三月全家移居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英国。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雪莱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兹亚海港泛舟去雷亨，中途遇风暴，溺死海中。

雪莱的一生是战斗的，但由于他是独自和反动势力斗争，他的一生也是显得孤独的。他自己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在一八一九年四月六日，他给友人写信说：“我想，除了五个人以外，凡是知道或听说到我的人都将我看作是罪恶和堕落所造成的稀世怪物了。”这样一种孤寂的、被敌意所包围的生活，如前所说，自然要引起不健康的情绪，使诗人不断地想到死，想到生活的虚妄和世事的无常了。因此，我们就看到象《无常》、《咏死》、《往昔》、《招苦难》、《长逝的时流》、《秋》、《时间》等一类诗。^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忧郁的心情是这样一种战士有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精神有了苦闷，自然要寻找解脱，

① 自然，这些诗并不尽是消极的方面：当诗人感于世事的变迁时，他也看到苦难只是暂时的，美好的一日必将到来。这也就提供了乐观的基础。

于是雪莱在某些方面找到了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哲学。当生活整个与自己为敌的时候，也许唯心哲学是较容易找到的遁逃藪吧？这种说法，自然并不是要追寻诗人自觉的意识过程。雪莱是严肃的思想家，他所以推崇柏拉图哲学，自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例如：可以和教会的宣道对抗）；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诗人引用在他诗中的一部分唯心哲学，也是很投合抑郁的心情的。那哲学告诉人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假象，另有一个更真实的、理念或精神的世界，它是非物质性的，完美的，永恒的，我们这个多变而不完美的物质世界就是它的投影。关于这，柏拉图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人类大多数仿佛是坐在地下岩洞中的囚徒，背对着火，火光把影子投射在岩壁上，人们便把这影子当作现实的世界。只有少数人（哲学家）转过身来，走上陡峭的石级，才能看到上面的阳光世界，看到“真实”。因此，要获得真理，就要把“灵魂的眼睛转过来”面对太阳，面对那个“真实的世界”。在柏拉图哲学中，这“真实的世界”有时叫作“理念”、“精神”或者“一”（与“多”相对）。

不难看到，雪莱的诗中有不少推理和形象是采自这种柏拉图哲学的。举例说，《别揭开这画帷》这首十四行诗就明显地把生活比作“画帷”和“幽深的穴中”的“幻相”。《颂天》中把天比作“人的头脑的第一层”，认为还有更高的“欢乐世界”在天外移行，如果能看到这个“世界”，那“天”就“不过象是从梦乡把日午的反射瞭望”罢了。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中尚有至高的理念，这篇诗里正是反映了这一思想。《赞精神的美》也是歌颂了柏拉图哲学的一种神秘经验。这虽是一首充满了真实热情的诗，但却奇异地构制在形而上哲学的基础上。在冷酷的、灰色的、扑灭了一切高贵行动的火焰的现实中，谁能不缅怀于他曾有过的光辉的一刻，

并期望那一刻的再现呢？诗人正是把这样一种生活实感通过唯心哲学的探索透露给我们。诗中所谓“精神的美”、“渺冥的灵气”、“美底精灵”、“较高的世界”，实则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诗人所看到的宇宙精神，就是“一”，万物由于充沛了它而发出光彩，大地失去了它就变为暗淡。人们由于无知，用“精怪”“天堂”等富于魅力的名称去称呼它。在初春，当诗人正在推究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与这种精神的融和，于是狂喜地握紧两手。诗人在该诗结尾说，就是这种宇宙精神使他知道克制自己的情欲并热爱全人类的，他希望能够长期充沛它，因为它能给他带来人不再奴役人的希望。

由此看来，雪莱之所以接受柏拉图哲学，基本上还是出于改造世界的意愿，出于求真的精神；他要追寻宇宙的秘密，要掌握自然与人间一切现象的总规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规律，才能顺利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斯宾塞的泛神论也是沿着同一追求的途径化进了他的诗里。举例看，象《爱底哲学》这样一首迷人的小诗，岂不是充满了这类哲学的影子吗？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姊妹把弟兄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这里既有泛神论，把“泉水”“轻风”“高山”“波浪”“阳光”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和人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体现物；又有柏拉图哲学关于灵魂的学说——就是，人的灵魂原是两性具备的、完整的，进入肉体后即变为分裂的存在，因此它永远追寻与它的另一半相结合；自然界也如此，“多”总是企图向“一”汇合，所以泉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大海。大海和太阳都是“一”的象征，万物“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亦即融于普在的爱情、融于宇宙精神中。这首诗以对爱人劝告的方式、以爱情的语言精炼地表现了诗人的一整套思想，确可以说是把动人的感性形象和丰富的说理美妙地结合起来了。

唯心哲学使诗人相信，人死后还有精神的存在，坟墓的那边并不就是黑暗和空虚，而是更美好的真实；因为，现世的缺陷和无常是不会被带到“那边”去的。这思想较明显地表现在后期诗作如《阿童尼》里面。在那首诗的结尾，诗人说，死去的阿童尼“没有死，也没有睡，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反而是活人迷于恶梦，象尸身一样在腐蚀着。这思想，就其否定生存的积极意义一点来看，自然是诗人的薄弱的一面。

我们可以说，唯心思想是诗人积郁的胸怀的必然产物；但同

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也是社会历史的一种产物，因为在一定的科学水平限制下，诗人对世界还不能达到更完善的解释。这给他的诗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弱点，如某些诗和某些片断在表现上的晦涩与朦胧即是。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它带来的就全是弱点。因为，如前指出，它正是体现了诗人对积极的世界观的一种追求；诗人从中所选取的，往往是符合于他的乐观的信念的那一部分思想，如《爱底哲学》所表现的就是如此。泛神论固然有其唯心的一面，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一种进步思想。恩格斯说过，“泛神论是达到自由的、人的观点的最后一步，”^①似乎就正是这个意思。柏拉图哲学相信人有一切崇高的性能，相信“理想国”，这不也恰好和诗人改造世界的理想趋于一致吗？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应看到诗人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继承者。现实的感受比哲学的泛泛之论要强烈得多；诗人生活在王权和教会的双重统治下，他要以诗来对阶级压迫的种种罪恶现象作斗争，这就不可能不使他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们看到，当诗人以坚决的革命者的身份来讲话的时候，他的诗就包含着清醒的现实感觉，他的刻绘就中肯而有力，他的声音也成了广大人民的呼声。而且，诗人越是为现实所激怒，他的洞彻一切的理性就越占上风，他的诗也就更清晰地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1819年的英国》、《给英国人民的歌》、《一只新国歌》、《颂诗》、《自由颂》、《自由》和《“虐政”底假面游行》等诗中所刻绘的现实，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其惊人的现实意义。资产阶级的批评家时常“惋惜”说，雪莱的诗把事物描写得过于黑白分明了，失去了朦胧的诗

① 见恩格斯的《英国状况》，此处自俄文转译。

意；但在我们看来，诗人爱憎分明，他全力歌颂光明和未来，又全力痛斥剥削、伪善和一切恶势力，这正是他的诗的真实优点。谁要是觉得雪莱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不切实际的诗人而已，他可以看看以上所举的诗是多么明确地掌握了现实和历史的辩证发展！在卡色瑞统治期间，亦即反动势力看来最强大而稳固的期间，诗人已经能看出自由底刽子手们是在走向坟墓了；他能从“死亡”、“毁灭”、“罪恶”和“财富”的欢笑的筵席上听到它们自我“毁掉！”的声音。他能看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虚伪性，说“议会”把“时间最坏的法令还不废除”。他能看到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宗教和法律都是欺骗人民的，是“害人的陷阱”。他断言“奴隶和暴君原是双生的仇敌”，因为，他相信，只要奴隶不肯自居为奴隶，暴君也就不存在了。他看到唯有“饥饿”和“苦辛”——亦即唯有无产者——才是自由女神的侍奉者，而他劝告无产者不要为那“合伙的打劫”（亦即由资本主义国家或国王们所挑起的战争）伸手支援，“你们是自由底儿子，只为她而战”。诗人对人类的压迫者“帝王”和精神的奴役者“教士”投以最深刻的憎恨：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
践踏为纤尘！不然，就写在土里，
好使这污渍在名誉之页上
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
所抹去，被平沙从后面覆盖！^①

对于教士，他说：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们的头脑

① 这些话不禁使我们想起诗人较早所写的《奥西曼德斯》那首讽刺“帝王伟业”的杰作。

照明这幽暗的世界的大厦，
使“教士”，这苍白的名字，退缩到
地狱里：这才是它原来的家，——
它本是魔鬼渎神的一声嘲笑；

诗人对未来，对人的光明品质从没有丧失过信心。他相信，是愚昧和欺骗使人民暂时尊奉了“压制”和“压制者”的，只要一旦自由底概念从人的精神深处把“智慧”引来，人类就会凭这“智慧”而获得解放。

在摘自长诗《希腊》的《“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一诗中，雪莱表现了他经常持有的思想，即世界的黄金时期是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和华兹华斯等消极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相信，在未来，帝国和宗教都将成为“残梦的遗迹”，财富和战争再也不致于蹂躏人类了。这是多么真实的预言呵！在《“虐政”底假面游行》一诗中，诗人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规定了“自由”的内容。什么是自由呢？对于工人，自由就是面包，衣服，炉火，和享有一个快乐而整洁的家庭；自由就是对富人的“一种克制”；自由就是公理，智慧，和平；自由是爱情，它的明灯是科学、诗歌和思想。由此看来，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雪莱就已完全明了“自由”不能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阶级性的；这一阶级的自由就意味着另一阶级的不自由。同时，自由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必须有其物质基础，贫困的人们是谈不到自由的。因此，他号召无产阶级说：

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显然，这一切都渗透着极为真实的思想，都是为社会历史的不朽的灵感所照耀着的。所以恩格斯赞誉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实非偶然。

不过，在认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雪莱把他在1812年表现在《告爱尔兰人民》中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是在某种形式下一直保留了下来。1821年所写的“伟政”就有这一痕迹。诗人在诅咒了那些帮助帝王统治的奴仆们以后，却劝他们要获取美德，要克服自己的情欲和意志。就是在《“虐政”底假面游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所号召的，也还是以仁义和智慧来对抗暴力，并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告诉人民“只须插起双臂，以坚定的目光观看，没有恐惧，更没有惊讶”，那么杀人者“就会羞愧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而这屠杀所流的血将赭红地写在他们颊上”。在今日看来，这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吧。当然，诗人领受了他那一时代的教训，也许他有理由感觉暴力革命尚非其时。

在抒情诗的领域里，雪莱一直被公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优美而蓬勃的幻想、精力充沛的现实刻绘、浪漫的感情、自然而浑圆的艺术、音乐及形象的美——这成为诗人在旅居意大利时期所写的抒情诗篇的特点。《西风颂》可以说是这类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将永远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这首诗里，诗人一方面以西风为中心，准确而有力地描绘了一系列自然现象，写出了树叶，流云，海洋等如何在西风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却以此象征了当时整个的现实：“枯死的落